

核心阅读

当前中美经贸领域的不确定性可能会波及市场信心，引发资本跨境内流动，也可能使得短期人民币汇率波动加剧。对于经贸关系背后隐藏的汇率风险，我们应保持战略定力，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金融体制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 尤 苗

5月19日，中美双方在华盛顿就双边经贸磋商发表的联合声明，这是双边经贸关系达成的重要成果。毫无疑问，这次双方经贸磋商是积极、务实、富有建设性和成果的，在发展积极健康的中美经贸关系方面达成许多共识。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双边经贸规模巨大，有分歧甚至有纠纷并不奇怪，关键是要把双方共同磋

（上接1版）

实现和落实总目标、总布局，在实际工作层面，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坚持新发展理念，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始终做世界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等等。

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到本世纪中叶，一幅13亿多人凝神聚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蓝图清晰可见：从价值追求到顶层设计，再到行动步骤，中华民族在对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时代重大课题的探索中，做出了既具有世界观意义又具有方法论价值的创新性回答。主旋律——合奏曲——若干个独奏，在30年纵深的历史大舞台上，56个民族正在演奏一曲我和我的祖国的华美乐章。

这就是中国可见的未来。

这就是中国未来在今天的投射。

“四”加“二”，是科学认识新时代中国基本方位的关键词

“四”是指，新时代有新矛盾，新时代有新任务，新时代有新思想，新时代有新地位。新时代有新矛盾。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

商作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中美经贸关系中还存在较多不确定性，其中汇率问题是一个重要方面。历史经验表明，贸易和货币密不可分，对于在经贸关系中的汇率问题，我们应当始终高度关注。

（一）

2017年初很多市场人士都预测，美元会随着美国经济好转和特朗普促增长政策的实施而攀升，但是去年美元却持续走低。在美国经济增长率、就业率、通胀率等宏观经济数据好于预期，特朗普减税政策也得以实施的情况下，美元却长期逆势走弱，自然会引发市场对美元走势和特朗普应对政策的诸多猜测。实际上，关于强弱美元还是弱美元，特朗普政府其实是有摇摆的，比如在他竞选刚开始阶段就多次对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进行猛烈抨击，认为“利率保持在零水平，是因为耶伦显然带有政治倾向，她在做奥巴马希望她做的事情”。这说明特朗普最初并不倾向于弱美元。但到了竞选后期，特朗普在美元的态度上逐渐发生了重大转变，2017年年初特朗普还未就任就猛烈抨击中国、日本和德国等国操纵汇率；还认为强势美元“正在要我们的命”，“其他国家借助资金供给与货币贬值处于有利地

位。中国和日本多年在市场上不断诱导货币贬值，美国吃了亏”。目前来看，特朗普似乎倾向于弱美元，很大程度是因为弱美元有利于实施他“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特朗普在美元汇率上的态度之所以不如贸易保护主义那么坚定，是因为货币问题更加复杂。汇率是影响国际贸易的关键因素，弱美元既可以提高美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扩大出口、解决美国巨大的贸易赤字问题，又可以为国内创造更多的制造业就业岗位，满足大众阶层的利益诉求，赢得国内选民支持；短期来看，似乎更有利于特朗普贸易政策的实施。但是美元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特朗普政府也必然深知强势货币对维护美元霸权的重要作用。因此，即使特朗普政府为了配合其贸易政策倾向于弱美元，但是从长远来看必然要维护其强势美元，巩固美元霸权地位，这才更符合美国优先的原则。这其实也是特朗普政府面临的一个难题：弱美元有利于美国出口和弥补贸易赤字，但是对维护市场信心不利；强美元有利于美元霸权但却对美国出口不利。如何看待和把握美元的强弱走势，将是特朗普政府关注的重点。当然，特朗普政府干预汇率的空间不是很大，市场力量才是影响汇率波动的关键，也就是说美国经济

的复苏程度以及市场投资者对美元的信心才是影响美元走势的重要因素。同时，鉴于美联储有相对的独立性，美国政府很难直接实质性干预汇率市场。即使特朗普政府还可以通过财政部参与市场来施加影响，在如此大规模的外汇市场中进行干预其难度可想而知。但是特朗普还是有“货币牌”可以出的，比如在美元过于强势时可以发表看空言论适当抑制，促进本国出口，增加就业岗位；一旦美元过于弱势，再通过舆论手段提高市场投资者的信心。

（二）

汇率波动是双向的，美元的贬值和人民币的升值是相对应的。2017年1月初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为69498，到2017年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为65342。2018年3月27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调升31个基点，报62785，连续3日调升，刷新2015年8月11日汇改以来新高。2018年3月30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2816，官方收盘价报62728，升幅创2017年10月11日以来新高。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总体呈现稳步上涨态势，截至4月24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幅度达3.23%。在中美经贸关系出现波动后，许多外媒开

始担忧中国是否会选择人民币贬值作为应对手段。比如美国外交学会国际经济高级研究员布拉德·塞策认为，“如果中国想增加火力，更有可能采取的措施是让人民币对美元贬值，这会给特朗普政府振兴美国制造业的目标造成直接打击”。虽然本币贬值可以促进本国企业出口，但这种以邻为壑的货币政策长期来看对各国都不利；中国作为多边主义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坚定地支持多边主义，坚持对外开放，不会通过人民币贬值来应对当前的贸易争端。4月11日央行行长易纲在博鳌亚洲论坛“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分论坛也表示，“我国货币政策重点是关注国内的宏观经济形势，服务于实体经济；我国的汇率机制由供需决定，是一个市场决定的机制，它运行良好，未来也会继续良好地运行下去。中国不会以人民币贬值来应对贸易争端”。实际上，近年来我国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汇率机制改革，随着我国汇率制度的不断完善及相关金融体系改革的不断推进，市场机制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可以弱化外部市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应对美国货币政策发生外溢性时，可以扩大我国货币政策的缓冲空间。总体来看，当前中美经贸领域的不确定性可能会波及市场信心，引发资本跨境内流动，也可能会使得短期

人民币汇率波动加剧。但长期来看，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不断完善、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以及国内金融体制的进一步深化改革，特别是人民币在国际市场接受程度逐渐加强，人民币汇率水平会保持在相对稳定区间内。

对于经贸关系背后隐藏的汇率风险，我们应保持战略定力，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实现产业升级，全面提高我国综合国力。以“一带一路”和自贸区建设为重点，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继续深化金融体制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召开要早于1947—1948年设立的关税总协定的会议，这不仅仅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在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缔造者们看来，货币问题应该先于贸易问题得到解决。如果贸易的竞争环境因为不可预见的汇率波动而完全改变，那么各国就不会愿意承诺削减关税。虽然今天的情形和战后全球经济重建的情况相比差别很大，但仍需要世界主要大国担负起大国重任，摒弃零和博弈的思维，以合作共赢的理念和切实可行的合作方案，战胜“以邻为壑”的单边主义，推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

战略视角

金砖合作推动全球经济治理良性发展

□ 米 军 贺宇慧

伴随着新兴经济体群体的发展，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弊端日益显现。现行国际经济秩序深刻影响着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发展，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地位的不匹配，决定了它们必然是推动变革的主要力量，且在全球治理体系的合作关系具有内在动力和长期性。未来，金砖国家深化全球经济治理面临诸多挑战，但依然乐观其成。

面临诸多挑战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化建设滞后制约其推动全球治理的政治意愿和行动能力。直到目前，金砖国家集团依然属于领导人引领性质的以论坛为主的决策机制，而凝聚金砖国家合作主要依靠共享类似发展阶段和未来前景，以经济驱动和政治信任为纽带形成的特殊多边合作关系。由于金砖合作不是依靠统一模式来引领，由此造成非正式特点突出，非机制化突出，合作成效不够。需要持续推进金砖国家合作的机制化，提升其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所谓全球经济治理，就是各国采取集体行动共同努力，旨在对全球经济事务进行共同管理。可见，集体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金砖国家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的发展。金砖国家组织只有实现一定程度的机制化，才能抵消各国分歧造成的消极影响，发挥集体行动的合力，提升金砖国家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的成效。

金砖国家各国自身发展面临的挑战。金砖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度不一致，经济结构高度不一致，虽然金砖国家经济基本面最近有所改善，但经济本身的脆弱性、风险性和不确定性仍然存在。金砖国家经济有较快发展，但在世界经济价值链分工体系处于外国位置。俄罗斯、巴西、南非主要是资源供给者，中国和印度是加工制造者，金砖国家出口的多数为初级产品或低附加值的工业制成品，这种国际产业链结构受外部波动影响大，对发达国家市场依存度高，经济自主权不足。金砖国家需要通过技术改进和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迈进第四次工业革命进程。总之，金砖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的显著差异以及各国经济结构面临的缺陷，



都将影响金砖国家把经济上的影响力转化为在政治上的共同行动。

金砖国家间的经济联系薄弱制约集体行动力。贸易是金砖各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联系纽带，但金砖国家的贸易关系总体上不够紧密，贸易结合度平均水平较低，五国相互间贸易只占各自对外贸易总和的5%。不仅贸易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而且金砖国家间投资只占五国对外投资的6%，投资潜力远未充分发掘。同时，金砖国家间经济一体化程度低，没有建立诸如金砖国家自由贸易区等一体化合作机制。因此，不提高金砖国家间贸易的结合度和互补性，金砖国家就会缺少深化经济贸易合作的动力，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各国合作的战略升级。

合作治理利好累积

金砖国家的诉求符合时代要求并具有民意基础。金砖国家在多次宣言中强调，金砖国家并不是要取代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治理制度，而是以改革者的身份要求现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适应新时代要求，以满足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发展需求，也得到广大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金砖国家具有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的坚实经济基础，也是其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根据国内外权威机构预测，未来新兴经济体仍将持续增长，金砖国家仍是后危机时代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危机的火车头，并将长期影响全球经济，这是金砖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最重要的基础。

“金砖失和论”是伪命题，共同利益交汇、战略协作需求与不断深入的务实合作是金砖国家合作的主流。金砖国家都是后起的新兴经济体国家，都是第三次现代化浪潮的弄潮者（也

因此对欧美既得利益者造成较大冲击），在世界资源的分配上是有共同利益的，这些是金砖合作重要的政治经济联系基础。有关学者的研究表明，加强金砖国家集团内部的合作将有助于每个国家更好地利用这些潜在的比较优势。更何况，以金砖国家为首的新兴大国之间的合作在促进多元化和外交平衡、减少对发达经济体的依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需要。只有金砖国家不断增强政治互信，加强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才能对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机制化建设需要加强

尽管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非机制化突出，各国在政策目标上存在分歧，但各国间超出预期的更广泛领域的务实合作必然会将机制化建设这一重大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为此，在完善现有的非正式化机制的同时，也应推动“软法与硬法兼施”的机制化构建，有利于降低内在不确定性。在机制构建上重点形成专而精、分工协作、优势互补的多元机制相互推动的立体合作网络，在合作主导权上，形成包容、协商、互动、共治的新模式，在参与主体上体现开放性和包容性，即政府引导、多方参与，互动对象不局限于金砖五国，也包括域外的其他国家及其各类主体。只有在金砖国家内部明确了底线，才能更利于商讨开拓共同事务，确定业务运行的共同规矩，机制化建设才可顺利推进。

